

集体暴力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HARLES TILLY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谢 岳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集体暴力的政治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OLENCE IN A RURAL COMMUNITY

JOHN J. HODGS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XFORD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集体暴力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HARLES TILLY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谢 岳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体暴力的政治/(美)蒂利(Tilly, C.)著;谢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ISBN 7-208-06282-X

I. 集... II. ①蒂... ②谢... III. 集体-暴力-研究
IV. 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7061 号

责任编辑 邱盈华

封面装帧 王小阳

集体暴力的政治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谢 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 插页 4 字数 227,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6282—X/D·1081

定价 24.00 元

中文版前言

虽然集体暴力在我们的世界里以令人沮丧的频率发生着,但是,它的形式、轨迹和强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表现明显不同。位于纽约的自由之家每年关于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报告,展示了世界各国丰富的暴力图景。例如,在有关印度那一章里,自由之家 2004 年的报告回顾了 2002 年的情景:

至少 58 人死于火车上发生的大火,当时火车上载着印度极端主义组织的成员。最初,人们谴责一名穆斯林暴徒对大火负责任,然后,在古加拉特邦(Cujarat)反穆斯林的骚乱中,1 000 多人被杀,大约 10 万人无家可归和失去财产。这次暴力由印度民族主义组织导演,他们为暴徒组织交通和物质供应,为他们提供印刷好的穆斯林财产损失记录。

自由之家描述的图景将我们带回到早些时候的一次暴力事件。这个“印度极端主义组织”正从一个朝拜圣地回到阿约迪亚(Ayodhya),后者在 1992 年遭到印度激进分子的破坏。朝拜圣地从此成为印度宗教和政治承诺的一个标记。

2003 年晚些时候,自由之家首次报道了 2002 年发生在古加拉特邦针对穆斯林村民的攻击。报告评论道:“自由信教的权利通常是受到尊敬的,但是暴力反对宗教的少数仍然是一个问题,政府起诉那些与这种攻击有染的人仍然是不合适的。”《人权观察》同意这种评论:“古加拉特政府没有带来正义,它应当对骚乱负责,在这个地区,数千名穆斯林被杀和无家可归,政府仍然是全国紧张状况的罪魁祸首。”

还是这一年,比较一下秘鲁与印度的情况。几十年的军人政权之后,秘鲁于1980年开始它艰难的民主政府的实践。政治斗争产生了广泛的集体暴力,阿马鲁(Tupac Amaru)、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政府背景的准军事武装和秘鲁军队自己一起来反对民主政权。高地原住民付出的代价最高。1990年的选举产生了阿尔伯托·佛基莫里(Alberto Fujimori)总统和情报局长弗拉基米罗·蒙特西诺斯(Vladimiro Montesinos)这种腐败的体制,最后因为佛基莫里的丑闻而崩溃,蒙特西诺斯于2000年的下半年逃往他国。相对公平的2001年选举将民粹主义者托莱多(Alejandro Toledo)推向总统宝座。

托莱多的两年统治要尝试在秘鲁实行民粹主义版本的民主,这种民主为土著人提供更多的保护和机会。但是,这种民主面临着由原来腐败和威权制度带来的严重障碍。例如,军队仍然坚持在军事法院审理它的当事人。《人权观察》总结道:

秘鲁法院系统的低效和无能——地方政府腐败和缺少透明度——促进了农村地区暴力事件的发生。警察利用致命的武力不合理地处理公开的抗议,有时带来致命的结果。像拷打和非人待遇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记者由于批评当地政府而很容易受到人身攻击和破坏。

最近几年,印度和秘鲁都经历了实质性和威胁性的集体暴力事件。上述两个案例表明,解释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可能会尝试解释诸如古加拉特这样的事件。我们也许会努力解释同一个地方不同暴力类型之间的联系,例如自由之家描述秘鲁的不同暴力类型。最后,我们可能会寻求解释印度和秘鲁两种制度之间集体暴力的差异性。这本书就是要进行上述三个方面的解释,用同样的基本原则来解释各种规模的集体暴力的变化与种类。

一般情况下,集体暴力的分析家倾向于选择两种解释形式:观念的和行为的。观念分析家强调意识作为人类行动的基础,他们赋予意识内容以极端的重要性:暴力观念产生暴力行为。行为分析家赋予动机、动力和机会以更大的影响,它们的基本点一方面鼓励攻击,另一方面控制攻击。看一下2002年印度教—穆斯林冲突,观念分析家倾向于强调印度教对于由穆斯林提出的有关威胁的信仰,而行为分析更倾向于把冲突解释为挫折和穷人以及四处游荡的年轻人天生具有攻击性引起的。

《集体暴力的政治》放弃用观念和行为来解释集体暴力,而是选择第三种解释模式即相关性解释。正如本书详细阐明的那样,集体暴力既来源于人们之间互动性变化,也是由人们之间互动性变化所组成。多数人际之间的交易是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在有些条件下,它们会给交易者带来伤害。本书对单个人的暴力关注较少,但是从一开始它就分析了人际互动过程产生的极其不同的集体暴力类型。它关系到产生伤害的社会互动,关系到至少两个作恶者,至少部分地根源于那些从事伤害活动者之间的协同。

更确切地讲,《集体暴力的政治》回答了以下5大问题:

1. 为什么集体暴力(不像自杀和个人实施的他杀)会集中爆发——经常是一个暴力遭遇的出现会触动另一个暴力遭遇的发生——然后进入低潮期?

2. 从事那些非直接伤害互动的人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迅速地转变成集体暴力,然后(有时也是迅速地)又回复到相对和平的关系?

3. 特别地,那些已经与他们的类型差异(经常是合作和通婚)生活多年的人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彼此相互攻击人身和财产?

4. 为什么不同的政治制度(例如民主的和权威的)在集体暴力的水平和形式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5. 维持和平的专家(例如警察和士兵)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暴力与非暴力行动之间进行如此经常而又迅速的转换?

但是,迄今为止,观念的、行为的和相关性的分析家都没有对集体暴力提供可信的解释,这些解释至多只是对上面5个问题的某个方面进行阐述。没有一个人收集可靠的证据来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我们面临着使用相关性分析解释上述问题的挑战。这就是本书的任务。

现在,我们应当很清楚,分析家经常使用描述集体暴力的大量流行语与本书的解释关系不大或者根本就没有关系。读完本书之后,我希望读者不要把攻击冲动、古老的仇恨、文化断裂、狂热或全球化看作是集体暴力的原因。相反,我希望说服读者,集体暴力是一种政治形式。诸如士兵、警察和军阀这些暴力专家经常参与集体暴力,在那些事件中,他们与政治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与政治更微妙的联系出现在暴力专家的不行动。

我们只从书中列举一个例子:政治边界的激活。明显的集体暴力涉

及边界的激活和加强。要求或代表某个“我们”总是表明将我们与“他们”分离开来的边界,不管他们是谁。但是,任何个人或人群都有多重身份,因此有多重边界。在印度,同样一批人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是作为工人、妇女、印度教徒、古加拉特邦的村民或某个种姓的成员而行动。边界激活就是从众多的身份中挑选两种相反的身份。

我们——他们边界的激活经常促进伤害性互动,而在此之前社会关系多少是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的。就像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种族屠杀表明的那样,暴力有时候发生在内部权力斗争以及围绕公共代表的控制方面进行。一般情况下,强调单个的我们——他们边界越强烈,互动中的伤害显著性越明显,所有暴力行动者之间的协同就越广泛。

哪种类型的边界对激活是即时的和有效的,它因制度类型的不同而不同。高能力制度一般能显著地限制边界范围,也就是哪些人能够表达诉求。例如,1989年之前,在高能力的非民主国家苏联,宗教派别成员、妇女种族团体甚至非正式的互助网络,都没有公开的作为政治行动者的身份,并且较少有机会获得这种身份。

在高能力的民主国家加拿大,与宗族或宗教相比,能够以某种公民身份(包括那些现在被剥夺公民权的人)而存在的类型成员,他们的声音具有更多被听取的机会。但是,在一般的民主制度中,新组织形成的障碍要少得多,只要这些组织模仿现存的政治行动者。因此,性别偏好的边界在民主国家里比非民主国家对公开的政治行动更加有意义,至于那些当事人他们会像那些被剥夺公民权的公民那样而不是像分离的共同体那样去表达诉求。

集体暴力中的边界激活又如何呢?当暴力从小规模迅速地变成大规模,三个过程通常在发挥作用,虽然顺序与组合不一样。首先,政治大亨从事他们的激活、连接、协同和代表工作;第二,极化通常伴随着或起因于大亨的工作;最后(经常是政治经纪和极化的结果),不确定性出现在边界附近。

在边界附近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暴力机会一般会增加,并且更加显著。暴力机会增加的原因是:人们回应建立在这些边界上的社会安排带来的威胁,这些社会安排包括他人剥削、财产权利和内部通婚。在所有的社会互动中,暴力显著性增加的原因是:现存的非暴力程序失去了它们的保证作用。

在这些环境下,变化有助于解释 1986 年到 1995 年之间发生在欧亚大陆围绕着国族问题而爆发的暴力事件。在这十年期间,主要政治力量包括美国和联合国对华沙条约、苏联和南斯拉夫中心权威的削弱作出回应,在这些被外国控制的地区,地方领袖诉求代表不同的民族,通过信号化而获得支持。这种信号化鼓励领袖强调种族边界,竞争被认定为有效的对话者,攻击他们虚假的敌人,压制他们的竞争者,并且与那些向他们提供动员资源的其他国家建立联盟关系。

所有这些产生了观察家所说的种族—政治暴力。国际社会于是对自治和独立的新要求更加不能接受。但是,军火商、雇佣军、毒品交易者、钻石商人、石油买卖者以及其他从弱中央政治控制中获利的人,继续利用这些种族冲突,甚至推动这些冲突。

类似的分析也可以有助于弄清楚战争、恐怖、革命、起义以及那些发生在相对高能力民主制度中规模更小的集体暴力。它证明了以下一个观点,即集体暴力取决于社会过程的汇合,包括社会边界的产生与激活。相关性分析揭示了那些关键过程是如何展开的。这方面的分析请阅读本书。

查尔斯·蒂利

2006 年 6 月 25 日于哥伦比亚大学

英文版前言

人类生活就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我们犯下错误，审视这些错误，纠正它们，然后继续犯更多错误。犯错与纠错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幸运、聪慧或者身边不乏有益的批评者，纠错胜过出错，这样，人类的能力与知识能够不断进步——至少保持一段时间的进步。当然，作为政治生活的过来人——既做学生也做教师，经验告诉我自己，事实的确如此。我不断地认识到，当我验证一条重要原则时，结果发现该原则有例外情况；当我证明某个关键观点时，结果发现该证据并不能使人信服；或者，当我找到某个更好的与他人交流观点的方法时，结果新辩辞导致我并不希望的误会。

我的第一本书批驳了我的博士论文，这样做至少可以使作者在受到攻击时不至于抱怨。这本书纠正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犯下的过错，那时，我否认集体暴力成为一个具有连贯性的领域，而是认为“多数的”集体暴力是作为谈判的副产品出现的，这些谈判本身并不是暴力的。接下来 30 年有关政治冲突的工作帮助我认识到早些时候犯下的过错。

虽然我仍然否认从所有集体暴力的事件中能够推导出一般法则，但是我现在相信，只有极少数偶然的机制与过程重复出现在集体暴力的全过程中——不同的初始条件、综合因素(combinations)和情境(setting)会因时因地在集体暴力的特征、强度与范围方面，产生不同的系统差异。我同时也明白，20 世纪 70 年代的研究使自己夸大了集体暴力的盛行程度——这本书把它叫做分散攻击(scattered attacks)和破裂的谈判(broken negotiations)，而忽视了争吵(brawls)、机会主义(opportunism)、协同

破坏(coordinated destruction)和暴力仪式(violent rituals)。活到老学到老。

当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遭受残酷的空中袭击时,本书正在写作中。它们——(甚至更多)引发的公共讨论——使得本书对恐怖主义的着墨比计划中更多。我仍然认为,恐怖是一种周期性的政治策略,它为各种行动者——而不是宗教信仰者、某个政治派别或某个阶级的人们——广泛使用。但是,公众对恐怖主义者的关心,迫使我更加留意那些针对平民的突然或者秘密攻击,而不是考虑这些行动与其他政治冲突形式之间的关系。我希望我的分析会有助于读者反省他们自己对恐怖的理解以及打击恐怖的公共政策。

大量有见识的读者帮助过我的生活与学习。真诚地感谢下面几位学者的批评和建议:罗德·阿亚(Rod Aya)、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克里斯琴·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卡门扎·加洛(Carmenza Gallo)、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迈克尔·哈纳甘(Michael Hanagan)、汉斯彼得·克里西(Hanspeter Kriesi)、费尔南多·洛佩斯-阿尔弗斯(Fernando López-Alves)、戴维·斯托厄尔(David Stowell)、西德奈·塔罗(Sidney Tarrow)、萨德赫·文凯特西(Sudhir Venkatesh)、伊丽莎白·伍德(Elisabeth Wood)、维维安娜·齐利泽(Viviana Zelizer),以及两位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读者。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听众也对本书的部分内容贡献了有益的批评。

我改编了我的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该文章名为《国家煽动的暴力——1900—1999》(State-Incited Violence, 1900—1999),发表在《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1995年第9期上,第161—179页。

现在该轮到你发现错误了,也许这些错误也能够被纠正。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 I

英文版前言 / VI

第一章 集体暴力的类型 /1

三个暴力场景 /1

观念、行为与社会互动 /5

集体暴力的类型 /12

机制、过程与解释 /19

目标 /21

第二章 作为政治的暴力 /24

暴力政府 /24

政治行动者与身份 /29

政治大亨与暴力专家 /32

制度的变化 /39

不同制度下的政治互动 /42

制度与暴力 /47

问题重置 /49

第三章 趋势、变化与解释 /51

暴力的世纪 /51

西方的暴力体验 /55

集体暴力的目录 /59

1989 年的集体暴力 /64

解释趋势与变化 /69

第四章 暴力仪式 /74

协议式暴力伤害 /74

炫财冬宴、鞭笞与绞刑 /80

制度与仪式 /85

仪式暴力评价 /94

第五章 协同性破坏 /95

作为征服的破坏 /95

阿尔斯特：一个绝好的案例 /103

解释的风险 /109

阿尔斯特的游行与对抗 /113

协同性与显著性 /120

第六章 机会主义 /122

机会主义者在行动 /122

机会主义机制 /124

内战中的机会主义 /128

其他制度下的机会主义 /134

1967 年的底特律 /137

机会主义的机制 /140

第七章 争吵 /142

行车纠纷的争吵 /142

18 世纪法国的争吵 /149

争吵变化 /155

第八章 分散攻击 /159

抵制革命 /159

弱者的武器 /164

斯温起义 /167

分散攻击的变化 /174

罗马式暴力 /176

第九章 破裂的谈判 /180

印度警察与村民 /180

使谈判破裂的机制 /182

示威 /186

法国的示威 /193

抵制税收 /198

破裂的谈判的变化 /201

第十章 结论 /204

欣快症解毒剂 /204

暴力波 /209

暴力与非暴力共存 /212

制度差异 /213

暴力专家的转变 /215

恐怖? /216

参考文献 /221

译后记 /237

第一章

集体暴力的类型

三个暴力场景

牛仔互射

“牛仔们端起他们的枪”，美国西部的作者戴维·考特赖特(David Courtwright)写道，

进行血腥的射杀。哈里·弗伦奇(Harry French)，一位堪萨斯的火车司闸员，目睹了牛仔们在火车末尾车厢发生的战斗。枪战因扑克牌游戏而起，当时一名牛仔说道：“我不喜欢玩脏牌。”另一名牛仔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在说：“我不喜欢与一名肮脏的无耻之徒玩牌。”结果，双方发生枪战，一死三伤。(Courtwright, 1996:92)

考特赖特认为，像上面这些年轻的单身牛仔只要长期待在一起，除非他们受到某些严格的纪律约束，否则暴力会不期而至。如果他们待在一起酗酒、赌博、耍枪，暴力发生的频率会更高、程度会更大。他们当中多数人是年轻的移民，他们为了寻找新的机会——诸如边疆垦荒、扩张农场、修建铁路和金矿开采——而经常更换自己的居住地。但是，这些问题最近也已经出现在大城市里，因为吸毒和居无定所而使大量的年轻人聚集在街头。所以，大城市恶性暴力事件的起因与边疆小城镇的起因有着相似之处，两种地方的暴力事件都无法控制，年轻人是暴力事件的主角，并且是单身男性。

村民袭击联合收割机和地主

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跟踪马来西亚村庄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变迁。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观察到村庄里的暴力与美国西部牛仔的暴力完全不同:

1976年,当联合收割机开始严重影响到村庄里穷人的收入时,整个地区经历了大量的破坏机器和消极怠工事件,就像19世纪30年代的英格兰。虽然省政府称这些事件为“蓄意破坏行为”(vandalism)和“偷窃”(theft),但是很显然,村民抵制使用机器的夜间活动仍然相当频繁。电池被从机器上拆下来,并扔进了灌溉渠,汽化器和其他关键零部件被打得粉碎;沙子和泥浆被灌进汽油箱;石头、绳子和钉子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被塞进螺丝钻里;可可树被砍倒,横在联合收割机通过的道路上;至少两台收割机被焚毁。这种抵制行为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强调。第一,很显然,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他们的目标绝对不是简单的偷窃,因为在破坏过程中没有一件东西失窃。第二,所有破坏活动都是在夜间由个人或小团体匿名进行的。而且,他们受到村民的保护,当警察进村调查时,这些村民声称一无所知,即使他们清楚是谁。(Scott, 2000:200)

多数情况下,斯科特强调,这些村民与地主之间维持着礼仪性的、恭敬的公共关系,尽管村民经常消极怠工、从地主的田地偷走了稻谷,甚至使用斯科特所称的“弱者的武器”。虽然地主会告发破坏机器者或者抓住小偷,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狭隘的关系状态中,如果村民们采取报复性的暴力活动或者进行公开的抵制,这种状态会丧失地主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卢旺达大屠杀

上面两个场景没有一个能够与1994年的卢旺达血腥大屠杀相提并论。1973年7月,卢旺达高级军事官员哈比亚里马纳(Juvenal Habyarimana)将军通过相对非血腥的方式获得政权。不久,他建立了一个一党政权,该政权持续了20年。哈比亚里马纳属于西北部的胡图族(Hutu),他在他的妻子和她的家族的帮助下进行统治。但是,他们面临着来自图